

■新作聚焦

胡学文长篇小说《龙凤歌》:

为君再作长歌行

□樊迎春

胡学文的《龙凤歌》是乡土故事,也是家庭故事,这是中国读者相对熟悉的长篇小说的题材类型,似乎很容易就被贴上宏大历史、百年历程、民族史诗等标签,然而,细读之后不难发现,《龙凤歌》虽讲述了一个跨越代际、人物众多、结构复调的故事,如果非要为这部作品锚定一种主题或类型,或正如其题名所言,是“歌”。与预设的厚重、宏大的标签相比,《龙凤歌》的篇幅、情感、节奏、关切颇有我们熟悉的古典“歌行体”风格。我们不能否认,不管采用什么体裁,在当下社会,带有传统色彩的乡土家庭故事已然不再“时髦”,胡学文却不遗余力投身于绵长的讲述中,似乎别有怀抱。

民间的“显”与“隐”

在“讲故事”的技术层面,胡学文马马娴熟。小说上卷的主角是母亲马秋月,这是一个相对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温柔善良、勤俭持家,对丈夫忠贞、对长辈孝顺、对子女慈爱,默默付出、悄悄牺牲,我们在太多文学作品中见惯了这样的女性形象,并为其戴上“伟大女性”“大地之母”之类的冠冕,却鲜少有人真正关切她们的精神世界与内心熬煎。《龙凤歌》走进了冠冕之下的女性内心,并将这内心无限扩大,扩大至需要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参与才能阐释的程度。毫无疑问,麻婆子是本雅明论述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她的讲述以及讲述中与听众形成的松弛、自然的互动氛围生产着当下时代久已失传的“灵晕”,马秋月这一人物的丰盈也在于参与了这种“灵晕”的生产与“讲故事”的技艺的操演。由杨令公与萧太后的野史引发的关于龙凤胎的心结,突然降临却持续多年的追赶白兔的梦游,以及父亲因为寻找枣红马而为她缔结了姻缘,都只能指向神秘的东方民间。

这种民间的威力具有本雅明念兹在兹的口头相传的美,如学者陈思和所论述的,民间文化形态“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种光明与黑暗共存的力量足以摧毁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女性,也足以挽救一个苦苦挣扎的痛苦的灵魂。胡学文深谙这些潜藏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知识”与“财富”,它们不仅真实地影响着我们的先祖与父辈的情绪与生活,也形塑了子一代的精神与思维。于是,胡学文将它们落于纸笔,勾勒了这个家庭故事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线条,让读者得以窥见物质匮乏年代中的苦痛与智慧,得以感知蛮荒岁月里的悲剧感与生命力。

到了小说的下卷,民间色彩悄然隐没,主要的叙事者变成了在上卷中被精心呵护的龙凤胎。母亲哺育他们成长,“凤”朱红如儿时一样,果敢坚毅,主宰自己的人生,虽然躲不过遇人不淑的悲剧,却也及时止损、全身而退;在母亲、妹妹庇护下的“龙”朱灯依然内向、软弱,好在也算走出乡村,吃上商品粮,并未辜负亲人。这是多么让人熟悉的故事套路,集全家之力培养出一个出人头地的寒门贵子。但他只是城市人眼中的“凤凰男”,还要时刻提心吊胆,怕被家人的行为连累。小说下卷的核心情节之一是幼弟朱丹的意外事故,围绕弟弟的违法和死亡,子辈的真实生活与相处状态得到了充分呈现,那个在上卷中如顶梁柱一般撑起整个家庭的母亲变成了被呵护和善意欺瞒的“团宠”,而最柔弱无助的朱灯反而变为“话事人”,成为这个家庭最为强大的精神支撑。这一地位的倒置是中国式家庭结构、性别结构的典型表现,胡学文叩问现代性图

胡学文长篇小说《龙凤歌》的篇幅、情感、节奏、关切颇有古典“歌行体”风格,将潜藏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的“知识”与“财富”落于纸笔,勾勒家庭故事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线条,让读者得以窥见物质匮乏年代中的苦痛与智慧,得以感知蛮荒岁月里的悲剧感与生命力。胡学文关切万家灯火中具体的每一盏,《龙凤歌》就是一曲为父母、为亲人、为自己,也为读者作的有关传统乡土与亲缘关系的“长歌行”

景之中的传统伦理,也在提醒所有人伦理的坚固与其内在的复杂。

故事的“实”与“虚”

麻婆子在下卷中隐身,但她的“继承人”朱灯已经长大。小说中插入了一段朱灯创作的“故事”,描写朱灯藏匿他乡的生活,这是朱灯的孝心,是可以应付父母询问的“续集”,也渐渐成为他自己不得不相信的内容。身为长子、长兄,无法为日渐衰老的父母分忧,无法为遭遇灾难的弟妹挡雨,这种内疚与痛苦恐怕也并不比父母少多少。详细、生动、有计划地编造朱丹的故事成为朱灯疗愈自身的“刚需”。母亲年轻时靠着麻婆子的故事度过为人妻、人母的艰难岁月,如今靠着大儿子讲述的故事度过漫长的晚年生活,心照不宣地维系着报喜不报忧的家和万事兴氛围。在小说结尾,母亲终于抱到了在梦中追逐多年的白兔,似乎要给予那些年轻时的诡异梦游一个完美的结局,胡学文也明示我们那是父亲的杰作。这个曾经一无所有的男人靠着自身的努力和贤妻的支持终于挣得一点家业,他可能也猜到了大儿子编造故事的用意,猜到了小儿子的结局,能为操劳多年的妻子做的事,恐怕也只剩下这一件:落实妻子深陷多年的幻象。父亲为母亲的故事落的“实”,和朱灯的故事的“虚”一样,守护着这个家庭岁月静好的幻梦。胡学文触及中国式家庭的核心本质,即便是表面的风平浪静也值得所有人乘风破浪去争取,即便是一场终究会醒来的幻梦也值得所有人用心去编织。

因为忙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和修改,胡学文连续三个春节没有回老家,父亲看似不在意,但在电话中,“父亲说老叔的儿子从江苏回县里了,老叔也从北京回来,家人团聚了。他没说别的,语气也无异常,但我还是听出了些什

么。毕竟,我三年没回老家过春节了,一些亲友包括邻居都问父亲,我是否回家。挂了电话,我心有不安,甚至说压力。”《龙凤歌》既是“龙凤”的同人代胡学文的生活观察,可能也是他离乡多年的心灵重负。这种对于故乡、亲人的复杂情绪,不只胡学文,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以及更为年长的路遥等人在作品中都有表现。这种复杂既包含着对于独自离开家庭过上更好生活的背离感,也有对于曾经禁锢自己的那片土地的不愿回首。正如莫言在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中所说:“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那些困扰母亲的民间故事像种子一样在儿子心中发芽、生长,妹妹替自己背着行李走在1984年的路上的背影永远在哥哥心中隐隐作痛。而父母双方的亲人故旧,村子里的左邻右舍,以及那些在白天黑夜来临过的风霜雨雪,都成为记忆中分不清黑白或彩色的模糊斑块,或成为丰富的精神资源,或构成不愿触碰的创伤。由此,“故事”有了应付父母、疗愈朱灯之外的第三层内涵,成为作家胡学文及其同代人的心灵救赎。

小说以“歌”名之,是父辈筚路蓝缕、子辈成长成熟的赞歌,也是生命遭际、世事无常的悲歌。胡学文以“歌行”的野心囊括祖辈、父辈的奋斗历程,寄寓从乡村到城市的知识分子对于故乡的暧昧情感与现代注视。作家情意绵长,游荡在内心多年而无处纾解的原乡情结似乎只能付诸“故事”,以麻婆子的口述为中介,以马秋月的心声为中介,以朱灯的编造为中介,也以自己的笔为中介。故事里是民间的风花雪月,是性别结构的艰难处境,是家庭美满的其实难副。胡学文关切万家灯火中具体的每一盏,《龙凤歌》就是一曲为父母、为亲人、为自己,也为读者作的有关传统乡土与亲缘关系的“长歌行”。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讲习所青年教师)

■创作谈

第一次读《包法利夫人》,我20余岁,参加工作不久。师范期间,读了大量名著,所谓大量,只是相对自己的过去而言,其实没多少。而这个量里,又多是大部头。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罪与罚》、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双城记》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等。借一次书不容易,贪婪心理影响着个人的阅读习惯,篇幅不是太长的作品排在后面,因而晚读了数年,《包法利夫人》即是其一。彼时,我更看重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语言,特别是人物,而对结构和叙述方式不是很在意。福楼拜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鼻祖,是因为他在叙述上有着极大的开创性。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有评论家也有作家。我迷恋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不是福楼拜创造性的叙述,而是放不下爱玛这个人物。

说实话,当时的我并不喜欢爱玛,甚至有点鄙视,她总是让我想到村里那些名声不好的女人。她太不安分,太过我行我素。她的结局,似乎也印证着传统的报应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却挥之不去,而且有着隐隐的心痛。再读,已过不惑,对叙述方式、叙述视角几近痴迷,当然也没有忽略人物。令我意外的是,爱玛的形象似乎有了变化,我不再讨厌,甚至对她还有相当的理解和同情。坦诚地说,我的宽容、包容是岁月的磨炼或馈赠,时间使个人的心理、想法、认知不同以往,但我同时也认为,爱玛确实在变,她可以随着时间生长。这个生长不是变老,而是应时就势,更有光彩,更为迷人。这是我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看法:人物形象要有生长的能力,可以活在任何时代,可以和任何时代的读者对话。结构、叙述、语言、题材当然重要,写作者都在做着种种突破,这也是小说差异性 or 风格所在,但无论怎样标新立异,人物形象也是衡量小说的重要指标。塑造鲜活、立体、能呼吸、能生长的人物形象,也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和以往的小说一样,《龙凤歌》写的仍是普通人物,其中的罗响身份虽然有点特殊,但我不认为他是浪尖舞者,而把他看作普通一员,因为这样的角色我自认把握得住。至少,他可以在小说里活着,且可以率性而为。

写作的意义,作家多有高论,表述或委婉或直接。对每个作家,在不同的年龄,其实追求也不尽相同。这个不同,既有思考表达的方向和内容上的差异,也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体力的下降,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位作家曾对我讲,写作要抓紧,到老就写不动了。彼时我四十几岁,精力充沛,从未有累的感觉,所以只是笑笑。近些年,我也感觉到了。写长篇如同马拉松,极耗费体力。以数年写一部的节奏,其实写不了几部,而计划写的数量远大于能写的数量。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先写哪部后写哪部。《龙凤歌》在计划中其实是排在后边的,不重要,恰恰是因为太重要,我想捂藏得久一些。但种植于心,时时生长,就这样跑到前边。

若言写作缘起,《龙凤歌》是为心为情而作,起码最初是这样。计划中的作品恐怕难以全部完成,像美国作家罗斯那样,一生写几十部长篇,还是很少的。那么,就应拣自己最乐写、最想写的先写出来。初始的意义,也是最恒定的意义。其它,就要读者去理解了。如果再明晰一点,那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我试图在他们身上注入生长的能力,当我拿不动笔的时候,当我想到计划中的作品不能全部写出的时候,不会有太多遗憾。至少,我为自己的内心、为自己的情感,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为大地上劳作和奔波的身影写了一部小说。他们在这个时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祈愿他们能够穿越时间,跨越空间,在我不可能知道的陌生地域,把不曾呈现的一面呈现出来。彼时,读者还愿意读,难以放下其中一个或数个人,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愿意搁在心里,并能从人物身上窥见遗落在时间幕后的尘烟,窥见尘烟里的渴望、失意、寂静和喧嚣,我就知足了。

窥见遗落在时间幕后的尘烟

□胡学文

文学名刊 近作扫描

近期扫描的新刊中,作家以笔为灯塔,在代际更迭与历史回响中,打捞文化基因的韧性。他们的写作或照亮历史的深渊,或刺破现实的迷雾,或在技术理性的冲击中重新确认精神的航向,在时代的浪潮中刻下一个个不容忽视的文学坐标。

代际中的精神航标

民间传奇和历史故事里蕴藏着无尽的能量,那些因时间流逝被掩藏的故事再次被作家发掘。马原的长篇小说《九路马堡的诱惑》(《十月·长篇小说》2025年第2期)以“故事群”的方式呈现,组合西南边地的神话传说与童话寓言,展现出有特色的富饶文化图谱。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3、4期连载的范稳的长篇小说《青云梯》,以滇南吴陈两家的家族史为轴,以边地视角重写近代史中的家国情怀,再现滇南百年历史变迁。邢庆杰的长篇小说《白光》(《中国作家》2025年第3期)则将目光投向民国时期的鲁西北平原,以少年孙振江制伏巨蛇的壮举拉开传奇序幕。在民间传说、集体记忆与时代变革的互动中,少年成长故事由乡土中国向革命叙事延伸。

远去的历史时期传来时代的回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无数人在时代转弯处面临平衡的问题。谈波的长篇小说《海边列车》(《当代》2025年第2期)对东北工厂生活进行再书写,聚

《人民文学》《当代》《十月》《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青年文学》:

眺望远航的灯塔

□杨凯麟

焦个体在呼啸的时代命运中如何实现精神突围。韩东的中篇小说《旷日持久的斗争》(《北京文学》2025年第4期)关注90年代都市知识分子的情感困境,这对恋人在亲密关系中的交锋揭示出时代价值的多元化。索耳的中篇小说《夜迢迢》(《中国作家》2025年第3期)以世纪末的深圳为背景,书写外来青年打工者在充满混乱与机遇的时代与混沌青春挥别。

新旧社会更迭带来的代际问题受到关注。钟二毛的短篇小说《谢辞辞》(《青年文学》2025年第3期)通过姓氏争夺,揭露传统宗族观念与都市新伦理的冲突。潘逸飞的短篇小说《他们游过泳,他们撒过谎》(《北京文学》2025年第3期)借养子身份困境探讨创伤在代际间的传递与修复。凡一平的中篇小说《鞍马山的清明》(《十月》2025年第2期)在祖孙三代守护山间孤坟的轮回中治愈创伤,家族精神得以淬炼和传承。这些作品中家族的根系在新旧间撕扯,有的沉淀为伤疤,有的则长出新枝。

倾听暗处的声音

看见被忽视的群体、听见暗处的声音,是文学写作的应有之义。正如王蒙在散文《文学和语言的魅力》(《北京文学》2025年第3期)中所说:“文学用善良战胜了邪恶,用文化战胜了暴行和黑暗。”在《当代》2025年第2期中,居于社会暗角的边缘群体被照亮。当父母衰老,“来自星星的

孩子”长大成人后该如何在社会生存?李燕燕走访孤独症患者家庭,在非虚构作品《长大的他们——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中作出回答,如何解决社会接纳缺失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共同考题。董夏青青的中篇小说《理解万岁》以盲人按摩院为切口,探讨健全人与残障群体之间共情与理解的可能。相较于因生理原因的相互区隔,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往往更为隐蔽。骆平的中篇小说《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人民文学》2025年第3期)中老宋与周启森相识多年却并未完全理解对方,只能从不同的言语中拼凑周启森的形象切片。何玉茹的短篇小说《隔壁》(《当代》2025年第2期)以一墙之隔的邻里关系隐喻人际关系的隔阂,一墙之内是家庭内部的情感错位,一墙之外的鲁大夫一家则暴露出底层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错位。书写跨越言语、猜忌和冷漠,渴望真正理解他人,这些作品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精神境遇。

在当下时代,关注那些居于幽微地带的女性的命运与困境,愈发成为写作潮流的趋势之一。马金莲的中篇小说《一小片绿》(《中国作家》2025年第4期)中妻子被默认为照顾患病公公的天然人选,小说细腻地描摹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困境。同样关注女性在家庭中的隐形劳动的是常芳的中篇小说《北斗指向西南》(《北京文学》2025年第4期),主人公在职业化名,以及作为母亲、妻子、女儿时的不同名字中不断“分裂”自

己,逐渐丧失自我。朱婧的短篇小说《当我绽放时》(《人民文学》2025年第3期)通过女性身体的变化,探讨权力、性别与阶层的复杂纠葛。云舒的中篇小说《支山》(《人民文学》2025年第4期)里,金融从业者章小溪总是被贴上“县长女儿”或“陈玉伟妻子”的标签,但她仍从权力场域与种种标签中勇敢地突围。女性的困境从未消逝,但她们的觉醒如同暗夜中的萤火,倔强而富有生命力。

驶向未知的远方

文学如灯塔,照亮人类文明之舟,随科技浪潮驶向未知远方的道路。古宇的中篇小说《形莫若就》(《北京文学》2025年第3期)中,主人公面对职场裁员和经济压力,试图通过自媒体创业寻找出路,这样的书写构成了技术时代普通人的缩影。何许人的短篇小说《兼职儿女》(《当代》2025年第2期)设置了一个“虚拟亲情”的情境,资本将情感量化,付费陪伴背后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情感荒漠。晓航的短篇小说《机器回眸》(《十月》2025年第2期)与阎雪君的中篇小说《真页西双人复》(《中国作家》2025年第3期)呈现了对人与机器共生的不同想象。前者探讨科技在填补人类情感空缺时的局限性,后者设置了一项芯片拷贝技术,以科技的入侵诘问着人类在技术狂飙时代的生存本质。

写作者的目光不止停留在当下日常,还投向

远方的天地。在全球化的世界,个体被抛向陌生的文化疆域,与不同的文明发生碰撞。在汤成难的中篇小说《收集词语的人》(《当代》2025年第2期)中,藏区牧民巴索与外来者田无字的相遇,编织出一场语言与心灵的对话。不同文化的交流也存在芒刺,钱佳楠的短篇小说《阿米拉》(《青年文学》2025年第4期)围绕跨国恋情,展现了跨文化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等。在淡巴菰的散文《风落儿》(《北京文学》2025年第4期)中,洛杉矶跳蚤市场的旧物江湖形成了一个流动的“临时共同体”。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作家关注着如何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中找到归属感。

回到文学现场,不同代际的作家带来新的实验探索与可能性。小小说《狂妄》(《北京文学》2025年第4期)是阿乙对文学文体的积极探索,5篇“效仿经典”的小小说并置生发出别样的阅读体验。《人民文学》“新浪潮”专栏、《十月》“小说新干线”专栏、“创写新力量”专栏和《北京文学》“新人自荐”专栏共同推出金晖、张乐其、潘虹、王陌书、荆隼雨、汪韵然、原宁辰、徐思炜、赵汗青和万小川十位青年作家的作品,以年轻一代的眼光带来对时代富有新质性的感受和体认。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文学的灯塔,用人文精神的烛照抵御虚无。穿行在记忆与现实之间,在驶向未知的航程中,这些文学的微小提示我们,坚持对现实与人性本真的书写何其重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